

30年教龄,400元工资,代课教师最美?

点评

张 渺

鹤岗副市长:肖像权

黑龙江鹤岗一起涉嫌“矿难瞒报”的新闻中,有个本不起眼的事儿,意外抢夺了公众的注意力。鹤岗的一位副市长,在执行公务的途中,与端着相机的记者狭路相逢。记者咔嚓一声按下了快门,副市长不乐意了,提出了删掉照片的要求。

拿什么要求呢?记者是来做舆论监督的,以权压人,岂不露骨?交情也是不行,萍水相逢,哪里来的交情。最终撤上台面的理由,是响当当的3个字:肖像权!

一向“我有肖像权”,有望成为2014年最新的热点词语,风头直追几年前的“我爸是李刚”。

那就来讨论法律吧。姑且不论“记者采访矿难”这种舆论监督可能合法拍照。一位公众人物,其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私权,也始终受着公共利益的限制。

肖像权不是逃避媒体监督的理由,这场肖像权引发的笑话,其实,并不好笑。

小涂:见义勇为



在被刑拘了两个星期后,小涂等到了一个“不予批捕”的决定。起因是,他“见义勇为”。

这件发生在深圳的“荒唐拘捕案”,并不复杂。2014年7月1日的晚上11点,来深圳世界之窗参加啤酒节活动的小涂,看到一个男子正在纠缠一个姑娘,他主动上前询问那姑娘是否需要帮助,得到了肯定的回答。小涂和那男子争斗起来,一脚出去,对方的左腿骨折了。

小涂进了看守所,他以为,见义勇为的自己算是正当防卫,应该很快就能出去,万万没想到,这一待就是半个月。

刑拘的后果是可能会列入档案,尽管警方也作出“不留案底”,协助申请见义勇为奖励的“补救”措施,但这一切,都不能掩盖半个多月前,那个轻率的刑拘决定。

最终,小涂买了车票准备回老家,见义勇为的他,“不敢”继续留在深圳了。理由听起来挺悲凉:怕被报复。

韩迎新:尚方宝剑



顶着“最美最强拆女市长”的头衔,吉林省舒兰市常务副市长韩迎新,被立案调查了。

“我有尚方宝剑!你们随便告,我不怕”,“我不懂拆迁法,不按拆迁法办”,2011年1月4日,舒兰市步行街的28家门面房被当地政府强拆时,当时还是副市长的韩迎新,对着被拆迁群众,喊出了这几句话。

话语被定格在镜头中,而基层地方保障房腐败、基建乱象,也一直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。执政者喊出无视法律的话,让人生寒,但又是什么成为她的倚仗,使她有足够的底气喊出这样的话的?

韩迎新的“尚方宝剑”到底是什么?用《半月谈》总编室副主任滕朝阳的话说,无论那是“红头文件”,还是“口含天宪的大人物”,都该一并被“及时处理”。

水木坑爹女:人肉搜索

一篇称赞自己父亲清廉的帖子,从水木社区网络论坛出发,红遍网络。发帖人被戏称为“水木坑爹女”。网友们手持“人肉搜索”利器,翻来翻去,似乎是看见,发帖人“在北京有两套房、东戴河有一套房”,其父亲方某“老家辽宁有10套房”。

爆料挺惊人,大伙儿满以为,这次,又能搜出官员了。孰料,剧情出现了转折。被抓获的两个疑似贪官的方某,一个“躺枪了”,一个“不是官”。网友的“激情反腐”似乎闹出了乌龙。

被当作“反腐利器”的人肉搜索,一直用周久耕的香烟和杨达才的手表,屏蔽着背后的一片质疑声。但是眼下有媒体撰文称,“人肉搜索”将“坑爹女”事件导入尴尬。

本报记者 张 鹏 马富春

教龄30年的甘肃省宕昌县乡村代课老师王世明,因为从1989年开始出远门打工过4年,中断了教龄,他至今没有转正,他认为,“可能永远也转不了正了”。

如今,他的工资只有400元。而当年与他一起代课的教师转正后拿到了4200元。

王世明“出名”,是因为一张黑白照片。崇山峻岭之间,一个人扛着一根几十斤重的木头回家。他的眼前,几乎没有路,只有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。这根木料是建完学校后剩下的,因为代课教师工资低,村民们便把这根木料送给了他。

这张摄于几年前的“木头抵工资”的照片,至今还时不时被网民翻出来,流传一阵子,感动一大批人。去年,他被评为“最美乡村教师”,可除了带回一块铜色的奖牌外,王世明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。工资条上还是雷打不动的400元。

王世明是1980年在郭家湾村当上代课教师的,当时他18岁,初中刚毕业。王世明清楚地记得,工作的第一年,他每月的工资是17.5元。两年后,他结婚了,陆续生下3个孩子。他的工资涨至每月40元,多了22.5元。

郭家湾村周边的几个村学,几乎被王世明教了个遍。教学条件一个比一个艰苦,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远,走的山路也越来越多。

这些山路,王世明再熟悉不过。宕昌县地处甘肃省南部,紧接青藏高原边缘,群山环抱,地广人稀。宕昌是甘肃出了名的贫困县,山大沟深,交通不便,人多地少,自然条件恶劣,十年九灾。2008年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、2013年的岷漳地震,宕昌县均未能幸免。

在孤岛般的邓家山,王世明一待就是9年,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学校。邓家山孤悬在山巅,200多口人,几乎都是文盲。邓家山小学最多的时候一学期有40多个娃娃上学。



王世明扛着木头回家

陈庆涛摄

逝者

张立国:一个远没有被完全发现的画家

实习生 赵雅娇

看见一幅好画,他会不由自主凑上前去。当他趴在画布上,会觉得身体就是画笔。别人作画有足够的时候,他没有,总嫌太阳落得早了。

他也会在月光下走着走着,突然就被脚底硌硬脱离的光影摄住了心魄,作画的冲动“汹涌”而来,返身跑回画室,准备纸的那一小段时间对他也是折磨。

“这种遏制不住的欲望得不到宣泄真是痛苦啊。”他说。

而这位痴心于绘画的画家再也不能体会这种“甜蜜的痛苦”了。7月14日,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、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立国去世,享年75岁。

他最常给学生讲:酷爱绘画和苛求完美是一个画家的先决条件,而强烈的爱是保证这二者的唯一途径。问问自己还有没有一开始学画、接触好画时心里那种怦怦直跳的感觉,骗得了别人,骗不了自己。

他的画布常被自己涂得面目皆非,看着不满意的要涂掉,看着满意但是禁不起时间磨蚀的也要涂掉。

“具有独立思考的学者型艺术家,儒雅的外表下‘潜伏’着叛逆的现代意识。”是张立国首次大型回顾展策展人王明贤对他的评价。

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,红色主题性绘画是当时的主流,艺术服务于政治,张立国也没有成为先进政治的绘画者。他在中央美院创作毕业作品《广阔天地》时,最纠结的就是把什么放在中心位置。在初期的素描稿中,丰收的场景中人物处于画面的中心,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。而到了终稿油画稿中,人物被降低到十分次要的位置,画面的中心成为色彩缤纷的天空。在有限的范围内,张立国选择了色彩与形式的自主性表达。

他说:“我喜欢自然、真实、面向未来。”

当现代艺术大潮涌来时,张立国同代艺术家的处境都很尴尬,只有少数人顺利完成了现代转型,张立国是其中的代表。他尝试着,把人画成影子,把身体画成线条,把水和河流画成色块,把建筑画成轮廓,构建一个线条、色彩和光影的世界。他给自己的画展起名“自律的绘画”,

这个消息,王世明高兴得像个孩子,“房子是给学生们盖的,我也要出把力”。

因为代课教师工资低,邓家山全村同意,给王世明分了两亩山地,以补贴家用。当年,两亩山地收了600多斤麦子,王世明把麦子卖了,全部捐给村里建学校。

房子盖好了,听说乡上搞退耕还林,可以分到一批树苗,他又赶了十几里山路,把树苗拉来,种在了校园的四周。如今,当年他亲手种植的这些落叶松已长到五六米高,亭亭如盖,守望着这座已经废弃了的校园。

丈夫的苦,没有文化的妻子郭社莲最清楚。那条山路,时常有蛇虫出没,秋天的草麻最毒,被“咬”上一口,痒痒难受。最苦的是冬季,大雪深过脚踝,滑倒摔跤是常有的事。“雨天一身泥,冬上天天感冒,经常掉着鼻涕。”

在这条山路上,王世明独自走了9年。他一个人,带三个年级,既是语文老师,也是数学老师,既是音乐老师,还是生活老师。

山里人家,日子大都过得紧紧巴巴。学生们的书本,教学用的粉笔,都是王世明每年从县城买了,再用背篓背上山。在崎岖的山路上,如果能碰见荡牛的学生家长,王世明还能轻松些,沉重的书本可以驮在牛背上。

但大多数时候,山路上除了他,就是他自己的影子。

学生们的学费,一时收不齐,到县城新华书店买书的时候,王世明只好拿自己的工资先垫上。缺的部分,先打欠条欠着。刚开始,新华书店的人不认识王世明,不肯拖欠,后来知道了这个代课教师的事,对方破例给他走了“后门”。

王世明没学过音乐,除了能吼两句秦腔,其他的歌一唱嗓子就把他“出卖”了。为了给孩子们上好音乐课,他就对着收音机、电视机学,“学会一首教一首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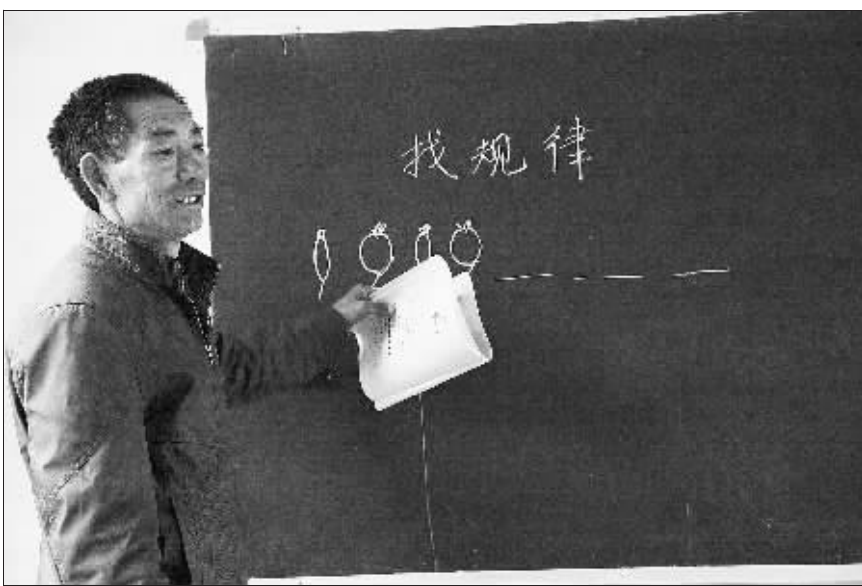
在邓家山,他为师严厉是出了名的。每当王世明家访出现在学生家的时候,正在看电视节目的学生,一见王老师来了,便迅速关掉电视机抱起书本。

一看是王老师来了,村头很多人都招呼王老师到家里喝茶。王老师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顺便走进了刘仇女家,她忙招呼大家坐下,倒完水,立马就要生火盆做饭。

山里人交朋友是以心换心。“王老师把我们邓家山的娃娃全都带来了。”刘仇女端着烙干的馍馍,笑盈盈地说。她的两个女儿也都是王世明的学生,如今早已出嫁。

在邓家山,村里的孩子他送走了一拨又一拨,“大的大了,出嫁的出嫁了”。邓家山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就是王世明教出的。

邓家山的9年,除了上课,王世明还要自己挑水做饭。面粉和菜



讲台上的王世明

本报记者 张 鹏摄

都是从家里背来的,他的饭几顿顿不离开洋芋,逢年过节才能吃上顿肉。

山里孩子的早餐,大多是啃干馍馍。王世明大清早起来就要忙着给孩子们烧热水。遇到中午不回家吃饭的孩子,王世明还要招呼学生们和他一起吃饭,左右都是洋芋饭。

9年间,王世明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:没有一位适龄学生辍学。

事实上,在去邓家山小学教书前,为了养活3个孩子,他打过4年工。妻子郭社莲回忆:当时,家里的口粮是以荞麦、青稞为主的粗粮,细粮很少。即便如此,面柜也要空了,“日子实在过得紧”。

1989年,王世明跑到青海刚察县的露天煤矿,当了一名挖煤工,每月赚100元。白天挖煤,晚上他帮不识字的工友写信、读信。“不识字的出门人,太遭罪啦!”他感慨道。

除了当过矿工,王世明还上新疆拾过棉花。可无论是在黑漆漆的煤场,还是在看不到头的棉花地,他都渴望再回到讲台。他坚信:“要走出穷山沟,必须要学本事。没文化,出去只能卖死力气。”

1993年,毛羽山村邓家山社办村学,一个月只有40块钱,没有老师愿意去。妻子对王世明说:“为了不识字的娃娃都能识几个字,管它有没有钱。”当时,3个孩子渐渐长大,需要有人看管。王世明最终决定上山教书,在邓家山小学,这一待就是9年。

2001年,邓家山教学点撤并至毛羽山小学。那一天,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这个“光杆校长”的心头:他担心以后学校离家远了,会不会有学生到了上学的年龄,不去上学,成为文盲。

王世明爱看电视剧,当看到《亮剑》里的李云龙拿起大刀喊冲杀的时候,他便感觉心头一热。

“英雄是能够为百姓谋利益的人。我没有干出什么成绩,做得不够好,只能做山里孩子多识几个字。”王世明说。

2001年,就在给邓家山小学捐粮建校时,王世明的大女儿考上了陇南师范,一年的住宿费和生活费要5000元。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,这位父亲犯了难。

按风俗,孩子高考考上了大学,家长应该摆谢师宴。他也想请大伙吃顿酒,但无奈囊中羞涩。最后,还是女儿学校的校长出面解了围:“王老师啊,这个面子给我,你就不要请了,我来请。”

临分别,这位校长还特意叮嘱王世明:“不能让娃娃不去念大学!”

王世明一连跑了好几天,亲戚、同学那跑了个遍,才借到200元。“连路费都不够,咋能给孩子念书啊。”

王世明不说话了,用大骨节的手,揉着湿漉漉的眼角。

从亲戚家借钱回家中的那天,王世明一个人独坐在立交桥上,足足呆坐了两个小时。最后,还是远在新疆的儿子,知道消息后,向战友东拼西凑,凑齐了姐姐的学费。送女儿上学的那天,王世明用塑料袋一层一层包裹着5000元,小心翼翼地交到了女儿手上。

命运似乎和王世明开了个玩笑。按照后来的国家政策,“凡是1984年以后一直在岗的代课教师都可以转正。”而因为从1989年到1993年中断的4年,王世明无缘转正。

王世明也参加过几次考试,都不理想。现在,他已经彻底错过转正的机会了。按照最新的政策,转正的代课教师需

世说新语

本来发现价格是市场的事 却依然辛苦官员

出门逛地铁 宅家啃煎饼

把煎饼当猪食,视金钱如粪土,打死你我也不信。

媒体说,北京市“我为公共交通价格改革建言献策”活动7月20日结束,17天来,上万市民参与活动,大部分市民都赞同上调票价,但认为幅度不宜过大,同时希望改善公共交通乘坐环境,如地铁安装屏蔽门、打击乞讨卖艺等。

虽有“首堵”和雾霾,但北京也有敢叫四海皆骄傲的大煎饼,就是以两块钱地铁票为代表的北京公交。这两块钱的物件是2008年从天而降的,虽然很贵,每年公交补贴上上百亿元,但这钱不直接从市民兜里掏,于是大家乐得出门逛地铁,宅家啃煎饼。

就像不相信地铁煎饼能长久飘香,我同样不相信“大部分市民都赞同上调票价”,手捧煎饼嘴不张?那不是觉悟,是生口疮了,是肚子积食了,是脑子进水了。因为大家都知道,时代不同了,地铁涨价是大势所趋,那只好多少涨一点吧,至于后面关于屏蔽门之类的希望,不过是无奈后的小树伤,聊胜于无。

回头想想来,真该埋怨领导了,把个煎饼供奉起来,给大家惯出了虚幻,以为两块钱坐地铁天经地义。如今要面对现实了,地铁要涨价了,令人痛苦不堪,还不如当初就冷酷到底。

我以为,如今的高铁也是个性价比的大煎饼。何以见得?——全国高铁辛苦苦一年,许多路段运营收入覆盖银行利息都困难,何谈收回投资?高铁赢利也是有办法的,就是涨价。但大家不高兴了,改坐大巴车坐飞机了,高铁更收不到钱了。高铁无法与公众消费水平相匹配,却仍然大干快上,只好靠行政资金和银行贷款供奉着。

为政治计而供奉的煎饼,不只是地铁和高铁,贵州供奉的是牛肉粉,一波教折。

也是在2008年,贵阳市商务局等部门推出了20家贵阳早餐示范店,“旨在进一步规范贵阳市早餐市场经济秩序,稳定和平衡早餐价格。”这20家示范店按照不同等级,共得到了80万元的奖励。但惠民政策并没有走得远,一个贵阳怎能扛住全国CPI的上涨?两年后,示范店早餐价格不但没有降下来,还从原来的5到6元涨到6.5到7元,空留示范店匾牌。

到2011年4月,新一批供奉牛肉粉浪潮复起,当地媒体点名此次是“源自民间的自发行动”——在贵州都市网贵阳生活

具备大专文凭,并且要通过普通话考试。眼看着他,他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有人评价,这个“最美乡村教师”成了“一刀切”政策的“牺牲品”,被制度有意无意地伤害了,他不仅“最美,还最悲情”。

如今,王世明几乎是村里最穷的人。用他的话说,这个家“贼来不怕客来怕——客人来了,发愁拿不出啥招待”。

妻子郭社莲煮了几个鸡蛋招待中国青年报记者的“不速之访”。至今,这个家使用的灶具是火盆。做饭时,烟熏火燎的,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。

有村民曾当面对王世明“冷嘲热讽”:“你干代课教师有啥意思呢,一个月的工资不如我们打工一天的钱?”

王世明的回答冷峻如铁甲:“人各有志,我爱这个职业。我相信老天会睁眼的,我不能前功尽弃。”也有人问他后悔当了代课教师吗?他答:“君子怨不怨天。”

但他毕竟渐渐地老了,2007年,他戴上了一只150度的老花镜,无论批改作业,上课,还是周末回家喂猪,这只棕边的老花镜成了他形影不离的“伙伴”。

因为2013年被评为“最美乡村教师”,他生平第一次到了北京。他看了天安门升旗,参观了国家博物馆,在航天博物馆见到了“英雄航天员”景海鹏、翟志刚,还到了北京大学听教授讲留守儿童的课程……

每一项安排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不过,回到宕昌后,他很少向学生和旁人讲述。他被自己的自卑打败了——“虽然我是最美教师,但是我是一个代课教师。上电视讲话的是我,其他人条件都比我风光,而我是穷山沟的土包子,活人的差距太大了”。

实际上,头戴“光环”的王世明的生活并未发生多大的变化。

学校照样会时不时地停电。在微弱的烛光下,王世明垂着头说:“作为3个孩子的父亲,我打50分,不及格。作为丈夫,我打30分,家里的农活全靠妻子一个人做。作为儿子,我打20分,老人有病的时候,我不在身边。”隔着一米多远,记者仍能感受到眼泪马上就要从他的眼眶里挣脱了。

山里寂静,突然雷声大作,大雨瓢泼。“作为老师,我最起码打60分。”这一次他没有停顿,语气坚定。

大女儿郭冯燕师范毕业的时候,王世明恳求女儿:“要懂得吃水思源。这一方水土养育了你,你必须为这个地方做贡献。”

原本有机会外出闯荡的郭冯燕,最后回到了老家,在临近的乡下一所中学,当了一名英语老师。不过,女儿的工资比王世明每月400元的工资翻了好几倍。

本报实习生 赵雅娇

世说新语

本来发现价格是市场的事 却依然辛苦官员

出门逛地铁 宅家啃煎饼

板块,一则帖子认为贵阳高价早餐存在暴利空间,指责“老板赚黑心钱”。一位自称是肠旺面老板的网友不忿,列出早餐的成本,称只要做成本店开得起,他马上关门。网友“王者7之志”应战要开店,肠旺面只卖4.5元,后来果然开门大红。接着,又有一对七旬老夫妇开了一家4.5元店,后更有“大赢女媳妇牛肉粉”打出4块钱的口号。有点像当年大跃进放卫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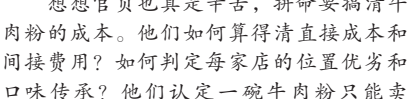
政府坚决支持群众运动,贵阳市旅游文化产业投资(集团)有限公司是贵阳市直属企业,它高调宣称:年内将出资1000万元开办100家平价早餐店,牛肉粉只卖4.5元。

如果这一轮供奉真是“源自民间的自发行动”,那就更麻烦:不为政治计的市民,竟也主动承担抑制通胀的社会责任,坚信牛肉粉是供奉起来的,且不贪图政府补贴——民,何以使之知?

尽管有民间自发和政府支持,但平价牛肉粉依然供奉不起。没辙,2013年贵阳市再次推出200多辆早餐车上街头,低于市价15%。从今年4月1日起,贵阳市又推出3家平价早餐示范店,期望一碗牛肉粉从8元降到6元。但3月后,贵阳市早餐价格依然不受示范。

想想官员也真是辛苦,拼命要摸清牛肉粉的成本。他们如何算得清直接成本和间接费用?如何认定每家店的位置优劣和口味传承?他们认定一碗牛肉粉只能卖4.5元,却又如何盯死每碗面没有偷偷减少一片牛肉?

30多年的经济改革多少有点白瞎了。本来核算成本、发现价格是市场的事,却依然辛苦官员,让官员屡战屡败。这下官员至少能做事了,算算这些年为供奉牛肉粉花了多少钱。有空的时候,也算算地铁和高铁的煎饼账。



本报实习生 赵雅娇

本报实习生 赵雅娇

本报实习生 赵雅娇

本报实习生 赵雅娇

本报实习生 赵雅娇

本报实习生 赵雅娇